

海内罕见的仇兆鳌自订《尚友堂年谱》

方 南 生

按年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传记式年谱，自宋以来，代有继作，至清代蔚为大观，为我们研究历史人物的基本情况，提供了宝贵的材料。来新夏先生所编《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出版）著录了清人年谱，包括自订和他人所编写的在内，约八百种以上。而在自订的年谱中，清康熙年间的仇兆鳌《尚友堂年谱》，是比较罕见的一种，来先生写了简要的经眼记，并指明该自订年谱手抄本，现珍藏于中华书局图书馆。

这部年谱虽属罕见，但始终未曾受到人们的足够注意。早先转相征引的尚有三家：杭州大学图书馆所编的《中国历代人物年谱集目》，曾著录一条《仇沧柱（兆鳌）自订年谱》，并指明它是据《民国鄞县通志艺文志》著录的。来先生曾加按语云：“杭目系据著录，似未经眼此谱。”的确，杭大图书馆同仁们在编写此书时，势难逐条经目。《民国鄞县通志艺文志》著录的仇氏年谱所据乃是“伏跗室藏本”，而清冯贞群之伏跗室藏书，现暂存宁波天一阁。近接天一阁文物保管所骆兆平先生来函云：“伏跗室所收藏抄本《沧柱公年谱》仍在，乃抄于清咸丰甲寅（1854）夏月。”可见杭大图书馆所著录之仇谱，非来先生所经眼之中华书局藏本。此外，清蒋学镛所撰《鄞志稿》卷十二“儒林传”中，亦列有仇兆鳌小传一篇，下注云：“出《仇少宰年谱》。”未知此一仇谱，是自订抑或他编？书海浮沉，现不知流落何方？故知仇谱虽罕，

但并非海内仅存。

中华书局图书馆所珍藏之仇兆鳌自订年谱——《尚友堂年谱》手抄本，装一册，白棉纸抄写，由于年久，纸已发黄。半页九行，行二十五字。楷书开放，有明末清初格调。前后无藏书章，天头行间无批语。每抄至“圣主”、“皇帝”、“王师”、“今上”、“圣驾”等，必顶格另起，以示尊敬。逢年提行另起，上写年号年月及农历甲子，下写本人年庚。正文择要记叙，简约不繁。前后共三十二页（其中空一页），全文约一万二千字左右。二十八页前为仇兆鳌自订，其后为男廷桂、廷模所续。二十二页以后，每页左上角有修补痕，但不影响阅读。该年谱开章明义臚列了自订年谱的宗旨，短序云：“韶华易逝，衰老渐臻，念祖宗积德之醇，起家儒业，荷圣主作人之厚，备位卿班。虽志在希贤，而未能寡过；亦心存报国，而徒托空言。追往事以滋惭，敢云自序；因儿曹之固请，略纪平生。或假余年，尚期耄学。章溪老叟沧柱父漫笔。”仇氏自述其写下这本年谱，是因儿曹之固请，故追叙往事，略述平生，非有心炫耀功业，以求传世。序云“备位卿班”，故知写此谱时，应在康熙四十七年戊子（1708）入阁之后，是时仇氏当已年逾古稀。按全谱约分四大部分：第一部分（1638—1658），记出生年月及求学入庠经过。第二部分（1659—1685），写开馆授徒至考中进士。第三部分（1686—1710），写仕宦经历及康熙恩遇。第四部分（1711—1717），写致仕后返乡及病逝经过（最后逝世部分，由其男廷桂等续完）。

谱主仇兆鳌，原名从鱼^①，字沧柱，号知几^②，晚号章溪老叟，浙江鄞县（今宁波市）人。明崇祯十一年戊寅（1638）十一月十六日生于鄞县东城章溪里。六岁入私塾，先后从学于骆宝权，陆可前等先生，二十二岁在横泾等地开馆课童。康熙八年己酉（1669），在杭州城南云居山上方寺开馆教学，十四年乙卯（1675）

预乡荐，二十四年乙丑（1685）四十八岁的仇兆鳌终于考中二甲第八名进士^③同年五月，钦点翰林院庶吉士，散馆授编修。三十三年甲戌（1694）冬，乞假还乡为其亡父迁葬。四十四年乙酉（1705）七月，升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检讨。历翰林院侍讲、侍读、侍讲学士，充皇太子讲官，武殿试弥封官、侍读学士。四十七年戊子（1708）十二月二十日特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，后转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^④。五十年辛卯（1711），兆鳌年七十四，以疾乞休，当年冬抵鄞。康熙五十六年丁酉（1717）十月初五，逝于家中，终年八十^⑤。仇兆鳌死后，据《民国鄞县通志·舆地志·历代名人冢墓考略》所记，葬于鄞县东九曲河。

从仇谱所记可知，兆鳌原配邵氏，邵氏逝后，续娶姚氏。后又聘吴门顾氏女为副室。康熙二十五年丙寅（1686）秋，在京师又娶侧室王氏。有三子：长廷桂，康熙四十一年壬午（1702）举人，诸暨教谕。次廷模，字宏道，康熙五十年辛卯（1711）举人，临乡知县，能诗。季子廷栋，早殇。孙启昆，字贞肇，乾隆二十五年庚辰（1760）举人，缙云教谕。以上参见《民国鄞县通志·文献志》。

仇氏平生著述甚富，除《杜诗详注》、《杜工部年谱》外，尚有《通鉴论断》、《四书约说》、《纲鉴会纂全编》、《天童寺志》、《参同契集注》、《悟真编集注》等，并刻过《道言秘录》丛书一套。

兆鳌祖籍山东。其始祖仇恣，字泰然，于宋徽宗大观年间，自山东益都来知明州（即浙江鄞县），封益都伯，遂家于鄞^⑥。仇谱康熙四十年辛巳（1701）下，有“秋尽还家，新居在县学之东厅，壁拈一联云：‘祖武宜绳，北自益都开南宋；圣人可学，西瞻泮水即东山。’”等一段文字可证。曾祖字晓湖，祖字庆元。父遵道，字公路，诸生，潜究理学，在乡以启迪后进自任，贤俊时出其门，卒年八十一。

仇兆鳌在杭州上方寺开馆教学数年里，曾往来于杭州、绍兴

间，在古小学书院，结识了明末清初大思想家、学者黄宗羲（梨洲），宿儒姜希辙（字二滨，号定庵，明崇祯举人，入清后官至奉天府丞，著有《左传统笺》、《两水亭集》等），相与研讨学问。梨洲先生曾作诗记与仇沧柱等于重九日登高事，并有专赠仇氏诗二首，其一云：“积叶窗前日日深，读书好自傍岩阴。百科已竭时文力，千载惟留当下心。坊社连环何足解，儒林废疾望谁鍼。凭君一往穷经愿，明月当前日未沉。”其二云：“禅院幽扉客至开，上方石壁翳苍苔。题名隐显钱江柳，弹指兴亡现去来。铿尔磬声留木末，悠然帆影过窗隈。城南胜地人文萃，好傍云山筑讲台。”按仇兆鳌入翰林院后，竭尽忠款为清朝廷做了许多文字校订工作。清蒋良骥《东华录》卷十三，记有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年（1686）十二月，编修励杜讷与学士张英，同侍《御批通鉴纲目》竣，曾奏请“颁发圣论，宣示史馆，以发涑水所未详，补紫阳之弗逮”。康熙虽准奏，并未立即付梓颁行天下，而是交翰林院有关人员校阅，以匡不逮。仇谱康熙二十七年戊辰（1688）条下，曾记兆鳌等奉旨校阅《资治通鉴朱子纲目》一事，并蒙圣上赐与蟒缎绫纱。其后仇兆鳌还曾参与修订《孝经衍义》、《大清一统志》等。康熙三十年辛未（1691），又参与修订《明史》。四十四年乙酉（1705），与彭会淇、顾图河等总裁纂修《方輿程考》。由于仇氏对清廷的忠诚，一向受到康熙皇帝的殊遇，多得青睐和赏赐，此不详述。

仇兆鳌自幼接受儒家正统思想之熏陶，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儒家的处世哲学和治学观点，这从他的整个年谱中可以看到。据说，在他二十四岁时，曾在泾水馆中得到程朱语类及蒙求等书，“朝夕参玩，理境渐明。”后因其与黄梨洲过往甚密，也多少接受了刘宗周（念台）“诚敬慎独，理在气中”的学说。入仕后，由于受当时以程朱理学为正统的学术思想的影响，以及当代名儒、大学士李光地等的薰染，不久便复服膺“理在先，气在后”、“理是

本”的理学三昧，归宗程朱学派门下。但他从不囿于门户之见，在其撰写《四书讲义》时，仍能兼采诸说，故曾受到程朱学派陆陇其的批评。晚年颇好养生之学。

仇谱除保存了有关兆鳌生平的非常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外，也较详尽地记述了仇氏编写著名的《杜诗详注》的过程。诠释我国唐代伟大诗人杜甫的诗歌，有宋以来，号称千家，而仇兆鳌之《杜诗详注》，“援据繁富，而无千家诸注伪撰故实之陋习，核其大局，可资考证者为多”（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），虽有若干不足之处，仍不失为一部富有特色的注本，一向受到杜诗爱好者的重视。

过去我们对仇兆鳌怎样编写《杜诗详注》，知道不多，现据仇谱摘补于下。

康熙二十八年己巳（1689），仇兆鳌已五十二岁，在京师翰林院庶常馆当庶吉士，除参与修订《孝经衍义》外，还开始辑注杜诗。当时虽只是一种业余爱好，但已有一些打算，要从五个方面着手编写：一是考订诗题岁月，二是注解诗中意义，三是指出典故出处，四是纠正前人谬说，五是采录诸家名论。这与详注原序“先挈领提纲，以疏其脉络；复广搜博征，以讨其典故。汰旧注之植釀丛脞，辨新说之穿凿支离”，基本设想是一致的。仇兆鳌朝朝暮暮诠注杜诗，用心良苦，自云：“予注杜诗，朝夕持诵，行吟庭除。”每每做到心领神会，方才下笔。正如其序上所云：

“注杜者必反复沉潜，求其归宿所在，又从而句栴字比之，庶几得作者苦心于千百年之上，恍然如身历其世，面接其人，而慨乎有余悲，悄乎有余思也。”这一段话，也正是他自己注释杜诗的真实写照。这样日积月累地辛勤耕耘了五年，至康熙三十二年癸酉（1693），《杜诗详注》始告辑成，“冬缮写进呈。有进表序文，备载杜诗卷首”。这篇进书表，现仍附于中华书局版《杜诗

详注》之后，概括地说明他辑注杜诗经过，恭进始末，以及对杜甫其人其诗的品评。尝云：“少陵诗集，实堪论世知人。可以见杜甫一生爱国忠君之志，可以见唐朝一代育才造士之功，可以见天宝、开元之盛而忽衰之故，可以见乾元、大历乱而复治之机。”充分肯定了杜诗的文学和史学价值，也表达了他本人维护儒家正统诗教的文艺观。

自此之后，他仍孜孜不倦地深入研讨，穷其堂奥，并为这部书稿的正式梓行，做了许多准备工作。如康熙三十四年乙亥（1695）二月，仇兆鳌为办亡父迁葬事乞假南旋，夏初抵杭州，于王汉槎斋头遇见朱乾若先生，仍“相与参论杜说”。三十七年戊寅（1698），年逾花甲的仇兆鳌，南下广东会友，在韶州晤研友学使左公峴，与同馆潘公次耕，商榷杜注。左峴，亦鄞人，字我庵，康熙九年进士，曾任广东提学，对经学等有所专研，著有《蜀道吟》。据仇谱记载，康熙三十九年庚辰（1700）冬日，“缮写《杜注》发刻，凡二十六卷，皆旌德叶承武所书”。康熙四十一年壬午（1702）四月，六十五岁的仇兆鳌，亲自携带誊写好的《杜诗详注》书稿，从鄞县家乡来到杭州刊刻。康熙四十二年癸未（1703）春，初刻成。三月，康熙皇帝南巡，仇兆鳌在杭州行宫恭进《杜诗详注》刊本二部，得御书“餐霞引年”四字绫匾。康熙五十年辛卯（1711），仇兆鳌以病乞休。三月买棹南归，于舟中辑成《杜诗补注》，并命次男廷模编次，作附记云：

“注杜始于己巳岁，迨乙亥还乡，数经考订。癸未春日，刊本告竣。甲申冬，仍上金台，复得数家新注，如前辈吴志伊、阎百史，年友张石虹，同乡张述可，各有发明。辛卯，致政南归，舟次辑成，聊补前书之疏略。时年七十有四矣。”

这是对他注杜的总结，与自订年谱各年所记吻合无误。吴志伊，杭州人，字任臣，号託园。通经史，兼精天官乐律之术，著有《周礼大义》、《託园诗文集》等，其学问素为顾炎武所推重。

阎百史，当是阎百诗之笔误，即清大经学家阎若璩，一生著述甚多。石虹为湖广黄安（今湖北红安）人张希良之字，康熙二十四年乙丑（1685）进士，散馆授编修，官至侍讲，著有《春秋大义》、《宝辰堂集》。迺可乃张远之字，据《四库全书·集部·别集类存目》著录，张远对杜诗有专研，撰有《杜诗会粹》二十四卷。以上四人，或以经术、或以文名知世，对仇氏注杜，均有所裨益与启发。康熙五十一年壬辰（1712）腊月，仇氏至吴门度岁，准备发刻《杜诗补注》。康熙五十二年癸巳（1713），仇兆鳌编纂完《诸家论杜》并作有附记。

从以上的叙述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：仇兆鳌自动手注释杜诗，至《杜诗详注》杭州初刻本告竣，共历十五载。再经过十年左右的搜集、修订、补充，爬梳抉剔，又在苏州刊印了包括补杜、詠杜、逸杜、论杜诸卷在内的后印本，前前后后共用了二十五个春秋，即在他逝世前四年，才算大功告成，几耗尽他晚年全部心力，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和研究杜诗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。

必须指出，此谱也有若干记载失实之处。现略举一例。康熙皇帝曾三次亲征西北噶尔丹叛乱集团。1690年（康熙二十九年），康熙第一次亲率大军出长城，于离古北口四百多华里的乌兰布通，击破了噶尔丹的骆驼阵。噶尔丹溃不成军，一败涂地，只好暂且投降。这次战役不少史书都有翔实准确的记载，仇谱却误记为康熙三十年事。事后回忆，难免出错。

这里，我们还可以附带搞清以下两个问题：

一，当我们读完年谱中由其儿辈续写的最后一段，对手抄本的来龙去脉，当可瞭如指掌。文云：

“天乎痛哉！不孝等崩裂余生，窃欲吮血含毫，以纪君恩而扬先德，乃先大夫谦衷若谷，遗命又未可违。用敢以先大夫手记年谱，将续登家乘者敬铄梨枣，以备名公大人之采择。”

又云：

“苦凶昏迷，略陈病逝始末，附诸谱余，伏乞大人先生，哀而锡以鸿章，垂之简策，不孝等感应没齿。”

从以上所引，可知该自订年谱手抄本之传世，是用以代替“行述”、“行状”。古时丧事，叙死者世系行谊、爵里、生卒年月，以便请议谥或牒请史馆编录，或乞求他人作墓志、铭传等，多备此简要事略，以作根据。事详《陔余丛考》、《文体明辨》“行状”一则。既视同“行述”，当不止一本。

二，中华书局所藏手抄本《尚友堂年谱》，恐非康熙五十六年作“行述”用之原抄本，而是乾隆年间或乾隆之后的转抄本。因该抄本中既避康熙之讳，亦数避乾隆之讳，似较伏跖室所藏仇谱手抄本为早出。虽然如此，这本手抄本年谱，仍同样具有历史文献之价值。

注：

①见本谱最后仇廷模等补记云：“又闻先大夫未生以前，王父梦有神人授以金锁巨鱼者，故讳从鱼。”

②见清朱汝珍辑《词林辑略》卷二。

③见《词林辑略》及《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》。

④钱实甫所编《清代职官年表》第二册“内阁年表”所记仇兆鳌在内阁时间，与本谱吻合。

⑤有关仇兆鳌逝世的具体时间及病逝经过等情况，可参见谱后其子所补述的部分。

⑥见《民国鄞县通志·舆地志·氏族表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华书局